

灯火阑珊处

当代学人自述 2

主 编
葛剑雄
丁 东
向继东

余英时

许倬云

魏光奇

杨天石

吴迪

阎长贵

述 弢

靳树鹏

李新宇

邓晓芒

许纪霖

杨东平

沈 睿

王明珂

傅国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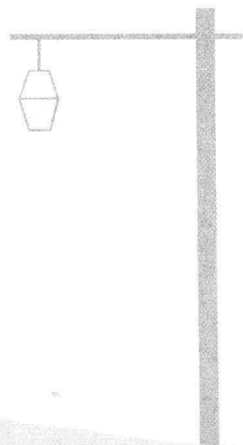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灯火阑珊处

——当代学人自述 2

主 编 葛剑雄
丁 东
陈 东



二十世纪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灯火阑珊处 / 葛剑雄, 丁东, 向继东主编.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5

(当代学人自述; 2)

ISBN 978-7-5391-8543-9

I. ①灯… II. ①葛… ②丁… ③向…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829 号

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2

葛剑雄 丁东 向继东 / 主编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57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8543-9

定 价 35.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3-38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总 序

《当代学人自述》是一套不定期连续出版的丛书。

所谓当代学人，主要是指进入 21 世纪以后仍然活跃在学术领域的学者，其生年上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下至 60 年代，因近二三十年为其学术的高潮期。本书展示的学人在专业上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兼顾某些文理交叉的学科；地域上以中国大陆的学人为主，兼顾海外华人学者。选择这种定位，意在向关心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走势的读者呈现当今学界群像，并为今后的学术史积累研究资料。

学者自述，固然可以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成果，但我们更看重求学、治学中的人生体验和心路历程。我们希望学者的自述文字，能够超越学科分工的阻隔，呈现普遍的意义。所以力求文风清通畅达，言之有物，不只面对专业同行和学界同仁，同时面对社会公众。

求学需要师承，机遇需要把握，逆境使人发奋，追求永无止境。每位学人，各有精彩。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社会历史的大转型，学界自然也处在激荡的巨变之中。这一时代的学人，从校门直接走向平静书斋的并不多，而是更多地经历了政治风雨的洗礼，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生命的历程由此而跌宕起伏，荡气回肠。

这一时代的中国大陆学人，赶上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告别个人崇拜和人格依附的思想解放大潮，有了重建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机遇，往往更具有反思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尤为编者所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希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精神追求的一个缩影。

本书汇萃的学人自述，篇幅不一，短则数千字，长则数万言。不求全面总结，完整回顾，只取思想的截面，精华的展示。这些文字，可以成为走近这些学人的一个向导。如果产生兴趣，还可以由此寻找他们更多的人生或学术轨迹。

编 者

2012 年 7 月

目 录

总 序	001
余英时	我走过的路 001
许倬云	我虽旁观，却开启了理解历史的经验 009
杨天石	学文、研哲与治史 ——从培训拖拉机手到步入民国史学术前沿 024
阎长贵	挫折也是一种财富 066
靳树鹏	从“歌德派”到独立思考 107
邓晓芒	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 119
杨东平	生活即教育 152
王明珂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176
魏光奇	自学之路 188
吴 迪	南北东西路 199
述 弢	哭泣的青春 220
李新宇	三十年书斋心事 251
许纪霖	刺猬与狐狸 ——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 265
沈 睿	走向女权主义 281
傅国涌	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 ——我三十年来的阅读史 302



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1月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熹的历史世界》、《现代儒学论》、《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等数十种。其治学传承中有创新，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

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讲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1937年到1962年。这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37年~1946年，乡村的生活；1946年~1955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年~1962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

我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从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但是时间都很短，记忆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我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这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今天回想起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

让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故乡——潜山县官庄乡。这是一个离安庆不远的乡村，今天乘公共汽车只用4个小时便可到达，但那时安庆和官庄之间还没有公路，要步行三天才能到达。官庄位于群山环抱之中，既贫穷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绝的。官庄没有电灯、自来水、汽车等任何现代设备，人们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对于幼年的我来说，这个变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内，我顿然从一个都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乡下的孩子。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记忆变得完整了，清楚了。

乡居的记忆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冈，长满了松和杉，夏天绿荫密布，日光从树叶中透射过来，暑气全消。我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时，曾在河边和山上度过无数的下午和黄昏。有时候躺在浓绿覆盖下的后山草地之上，听鸟语蝉鸣，浑然忘我，和天地万物打成了一片。这大概便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吧！这可以说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乡居八九年的另一种教育可以称之为社会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热闹，到处都是人潮，然而每个人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孤独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

但每一个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岛，即使是左邻右舍也未必互相往来。现代社会学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实古代的都市又何尝不然？苏东坡诗“万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说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几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亲戚，这种关系超越了所谓阶级的意识。我的故乡官庄，有“余”和“刘”两个大姓，但两姓都没有大地主，佃农如果不是本家，便是亲戚，他们有时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主凶恶讨租或欺压佃农的事。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但这样的情形也不多见，我只记得我们余姓宗祠中举行过一次聚会，处罚了一个屡次犯规的青年子弟。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一切，我当时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于我的故乡和现代世界是隔绝的，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现代人类学家强调在地区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须身临其境（beingthere）和亲自参与（participation），我的乡居就是一个长期的参与过程。

现在我要谈谈我在乡间所受的书本教育。我离开安庆城时，已开始上小学了。但我的故乡官庄根本没有现代式的学校，我的现代教育因此便中断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仅断断续续上过三四年的私塾；这是纯传统式的教学，由一位教师带领着十几个年岁不同的学生读书。因为学生的程度不同，所读的书也不同。年纪大的可以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之类，年纪小而刚刚启蒙的则读《三字经》、《百家姓》。我开始是属于启蒙的一组，但后来得到老师的许可，也旁听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解，包括《左传》、《战国策》等。总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于中国古书，一切现代课程都没有接触过。但真正引起我读书兴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说。大概在十岁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残破的《罗

通扫北》的历史演义，读得津津有味，虽然小说中有许多字不认识，但读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义。从此发展下去，我读遍了乡间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这是反《水浒传》的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我相信小说对我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使我终于能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

我早年学写作也是从文言开始的，私塾的老师不会写白话文，也不喜欢白话文。虽然现代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和陈独秀都是我的安徽同乡，但我们乡间似乎没有人重视他们。十一二岁时，私塾的老师有一天忽然教我们写古典诗，原来那时他正在和一位年轻的寡妇闹恋爱，浪漫的情怀使他诗兴大发。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的两句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诗句表面上说的是庭园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这位少妇偶尔来到私塾门前向他微笑。我便是这样学会写古典诗的。

在我十三四岁时，乡间私塾的老师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随着年纪大的同学到邻县——舒城和桐城去进中学。这些中学都是战争期间临时创立的，程度很低，我仅仅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一点简单的算术。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那里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诗文。所以我在这两年中，对于中国古典的兴趣更加深了，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

大变动中的流浪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在桐城。因为等待着父亲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读书，便在桐城的亲戚家中闲住着，没有上学。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这里要补说一下：父亲在战争时期一直在重庆，我是跟着伯父一家回到乡间逃避战乱的。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学的是西洋史，战前在各大大学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沈阳，创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经过北平，然后去了沈阳。

这时我已16岁了，父亲急着要我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进大学。1946年至1947年间，我一方面在高中读书，一方面在课外加紧跟

不同的老师补习，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目。我在这一年中，日夜赶修这些课程，希望一年以后可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个字汇是陌生的。这时我已清楚地认识到，我大概绝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好在我的兴趣已完全倾向于历史和哲学，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我的治学道路也就此决定了。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因为紧接着便爆发了国共内战。1947年底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学期后就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1948年到北平的十个月里，我自己思想上也发生了极大的波动。这是中国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北平更是领导全国学运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当时便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不断地向我进行说服工作，希望我加入“革命的阵营”。这样一来，我的政治、社会意识便逐渐提升了，我不能对于中国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趋势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学的学生，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深入地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当时的学生运动虽然由中共地下党员领导，但普通的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内幕，他们仍然继承着五四的思潮，向往的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我在北平期间常常阅读的刊物包括《观察》、《新路》、《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不过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共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拥护西方式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自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对极端的激进思潮则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

言是过于武断了。总之，1948 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对西方文化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兴趣。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1949 年夏天，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离开了上海，乘渔船偷渡到舟山，然后转往台湾。我是长子，父亲要我料理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这一年秋天，我考进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从 8 月到 12 月，我又恢复了学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学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之外，我更系统地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个时期，我们还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不过越讨论下去，不能解答的问题也越多，而且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学术和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 1949 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原来他们又从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 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一个月之后，我进入新亚书院，这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

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学校，由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 1949 年秋天创办的，学生人数不多，也都是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从此我便成为钱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基础。

钱穆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一般称之为传统派，恰恰与西化派是对立的。他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上有开辟性的贡献，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坦白地说，我最初听他讲课，在思想上是有隔阂的，因为我毕竟受五四的影响较深。不过由于我有九年传统乡村生活的熏陶，对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我并无强烈的反感。到香港以后，我又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我也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是我继续承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我对于钱先生的文化观点有距离，也有同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中国史学上的深厚造诣对我的启示极大。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

自己的观点。我必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

另一方面，我也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我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困扰。这不仅是学术问题，并且是现实问题。中国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又可能走哪一条路？要寻找这些答案，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不可缺少的。

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在 20 世纪有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的进步是愈来愈专精，代价则是分得过细之后，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怎样在分析之中不失整体的观点，对于今天研究历史的人，这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带着这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我最后到了美国。

美国的进修

我在新亚时代，在钱先生指导之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与此同时，我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协会两个图书馆中借阅西方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书。但我在香港时对西方学问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肤浅的。1955 年到哈佛大学以后，我才有机会修课和有系统地读西方书籍。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在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由于我从童年到大学时代都在战争和流亡中度过，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按部就班的知识训练，我对于在美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是十分珍惜的。从 1955 年秋季到 1962 年 1 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第一

年我是访问学人（visiting scholar），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后终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创获的。尽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升教授的指导。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总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这是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学者典型。杨先生和日本汉学界的关系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宫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杨先生的鼓励之下，我也开始关注日本汉学界的发展。这又是我在哈佛大学所获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由于时间所限，关于在美进修的一段，只能简单叙述至此。我在学问上走过的路，以上三个阶段是前期最重要的三大里程碑。后来三十年的发展都是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出来的，就不详说了。



我虽旁观，却开启了理解历史的经验

许倬云

江苏无锡人。1930年9月出生，1949年赴台，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198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著述等身，著有《西周史》、《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汉代农业》、《万古江河》、《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心路历程》等数十种。

上篇 我的人生历程

一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学，和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比如说沈治平教我们英文，他上课不是叫我们背课文，而是教我们解析句子。他是在游戏中教我们学，比方说他会让一个同学说一个词开个头，然后让其他同学一个个接词组成句子。一堂课下来，大家共同组成的句子写满了一黑板。

因为我身体不好，小学初中都没有读过。忽然在 1945 年猛一头栽到正常的中学里去，很不适应，虽然国文和历史的底子打得不错，但是英语、化学、物理都没有底子。学校对我也很宽容，国文和历史两门课给我的自由度很大，可以让我自己看书。还有我们下了学之后，五六个同学组成一组，哪个同学哪个科目特别好，就帮其他同学辅导，互相帮忙。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们那时 4 点半下课，然后就在一起学习，不到 6 点我们都不回家。当时那些非常要好的同学，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 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那时中国的局势变得非常动荡。作为难民学生，我读了三个月的高三下，那三个月没有读到什么书。第一是生活不安定，二是当时我读的那个学校跟我原来读书的辅仁中学没法比。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在无锡留下来绝对不可能。恰好我当时有个姐姐在台北，所以全家的兄弟姐妹从四面八方赶到台湾去了，我也跟随父母在那时到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 360 万人口，突然增加了 150 万人。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但是当时支撑自己的信念就

是为了自由。但是在自由和民族之间做出选择是困难的，经历了抗战的那一代人对于民族看得很重，“中国”这两个字在人们的心里是神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台湾是因为它是中国的地方，还有“中华”两个字的国号，虽然在蒋家统治下也没有多少自由。

二

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之后在本校第一次办的文科研究所读的硕士，然后又到美国去读书。这就是我大概的求学生涯，其中最重要的时期就是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些从大陆撤到台湾去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人数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可以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其他的同行不太一样：我关心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同时兼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我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自由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这让我跟别的同行比起来在专精程度上感到很惭愧，要说终身做得比较集中的一件事，那就是上古史。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和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我在台大的时候，跟李济先生学的考古学，跟李宗侗玄伯先生读的是古代社会，跟董彦堂作宾先生学的是商周的年历学。……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不愿意出门的老先生，就让我们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车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的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跟中国古代社会串